

# 汪張交惡事件再探討（1932年）

周美華

## 摘要

1932年8月初，時任行政院長的汪兆銘突然通電辭職，並斥責張學良「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要求張學良同辭。為此，行政院總辭，汪張二人亦隔空叫陣，一時之間，軍政各界騷動，一場政治風暴，隱然開展。

過去有關此一問題的探討，著重於汪為什麼要發動政潮？又為何選擇張為攻訐對象？剖題明確，但焦點卻集中於蔣（介石）汪之間的權力爭鬥，而將張視為汪與蔣抗衡的「靶子」。事實上，「權力爭鬥」並不是衡量問題原委的唯一標準。近年，有人指出不應忽略汪在「對日問題」上的認真與急迫態度，基本上提供了另一角度的思考，但就事件的發展和背後所隱含的意象而言，還是不夠的。

本文以汪張互訐電文所呈現的問題，對照目前的研究論點，利用國史館典藏的《蔣中正總統檔案》、《閻錫山檔案》，以及相關的資料文獻，從汪兆銘因應時局的想法、態度，和蔣汪張三人的抗日理念著手。結果發現：蔣汪張三人其實都希望中國能對日進行抵抗，只是站在各自的利害關係考量上，抵抗的時機和條件有所差別罷了。汪肩負政治責任，承受輿論壓力，傾向於「無條件抗戰」。即不論準備與否，勝負不計，打了再說。而張站在東北軍的立場，要求的是「統籌抗戰」，在中央未有準備和決心以前，寧可避免與日發生衝突，也不願以東北軍作「瓦碎」似的犧牲。基本上，汪張交惡的引爆點，就在這一急一緩、立場各異的抗日態度上。而蔣基於中日國力對比的考量，和自身對共軍發展的疑懼，深信「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所以目標是放在「安內」上，對日則傾向於「緩兵備戰」。因此，蔣對汪張交惡事件的因應，著重在「維持現狀，安定政局」，以便早日完成剿共軍事，但仍要求張進兵熱河，以資準備。

如此，三人基於利害關係的考量不同，在抵抗問題上的步調不一，又不肯開誠布公的協商討論，才會相互猜疑，進而導致此一事件的發生。

**關鍵詞：**蔣介石、汪兆銘、張學良、抗日、熱河防守問題

# A Reinvestigation on How Wang and Zhang Came Into Conflict (1932)

Mei-hwa Chou<sup>\*</sup>

## Abstract

In the early August of 1932, Prime Minister Wang Ching-wei(汪精衛) suddenly telegraphed to request a resignation and also asked Zhang Xue-liang(張學良) to resign his post too accusing Zhang of "drawing together his crowds in the false name of national defense." Because of this incident, all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ials of the Executive Yuan resigned as Zhang and Wang scolding each other. At that time, the political storm among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ircles began to shape.

The discussion of this very problem in the past focused on why Wang initiated the political turbulence and why Zhang was selected as the target of attack. The analysis of this problem such way had a clear premise while the focus was on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Chiang kai-shek(蔣介石) and Wang, taking Zhang as a "bull's eye" of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Chiang and Wang. As a matter of fact, "power struggle" is by no means the only criterion to measure the root of this problem. Of recent years, some scholars proposed that we should not ignore Wang's earnest and urgent attitude on "issues toward Japan." This alternative analysis presented another perspective that helped clarify the root of this problem. But this argument still seemed inadequate in explaining how the event went along and what hidden implication the event had.

This paper on the one hand discusses the problems presented on the telegrams where Wang and Zhang attacked each other, studies the current research arguments in question, and makes use of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available in Academia Historica, including "*The Chiang Kai-shek Collections*" and "*The Yen Hsi-shan Collections*". By analyzing Wang's ideas and attitudes towar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s at that time and by understanding the basic ideology that hid behind the Trio's fighting against the Japanese invasion, we discover that all the three political figures actually stand in the same positions: they hope China could fight against the Japanese imperialism. What makes them different is when and how China should respond with wars since the three individuals have their own

---

\* Assistant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base of benefits. Wang, who takes responsibility in politics and has to face pressure from the press, is liable to have "unconditional fighting back": no matter whether China is well prepared or whether the war could be won or lost, the first principle is to fight back the Japanese in no time. Zhang, who stands in the posi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army, asks to have a "all set fighting": the Chinese try best to avoid any battles with the Japanese unles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well-prepared and highly determined. He does not want the Northeastern army fighting along in the wars. Basically this different viewpoint results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Wang and Zhang: one believes that the war is urgent and immediate while the other insists on delaying it. At the same time, Chiang who takes into account the huge gap in national power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nd who expresses fear on the fast progress of the Communist Army, believes that the Chinese are "not able to fight against external invasion unless we can have domestic problems settled and the whole nation gets internally united." So the priority for Chiang lies in "having domestic problems settled" and his attitude toward Japan is therefore: "get ourselves prepared and wait." Thus, Chiang's response to the conflict between Wang and Zhang remains to be: "keep the current situations and ensure a stable political environments", in order to complete the sacred mission to eliminate the Communist army and to get prepared for the war by making a request that Zhang drives his force to Rehe(熱河).

This way, the Trio obviously have a conflict of interests and have disharmonious steps in fac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 without being willing to negotiate the related problems openly. Since they are doubtful of each other, the unfortunate event thus happened.

**Key words:** Chiang Kai-shek, Wang Ching-wei, Zhang Xue-liang, Fighting Against the Japanese Invasion, Defense Issues in Rehe

## 汪張交惡事件再探討（1932年）

周美華\*

### 壹、問題蒐探

1932年8月6日，汪兆銘（時任行政院長）突然從上海發表了五則辭職通電，其中他給行政院各部會的電文說，他的辭職理由「具詳於致張主任學良電」，並且說「此實為弟個人引退之原因」。而他給張的電文上，嚴厲地指責張，「去歲放棄瀋陽，再失錦州」，「因循經年，未有建樹」，如今熱河告急，又「未聞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希望張和他一起辭職，「毋使熱河平津為東北錦州之續」。<sup>1</sup>

汪電一出，全國大嘩。張的直接反應，便是汪「公報私仇」。張認為「值此外侮日亟，千鈞一髮之際，原應共赴國難，私人之間詎容再生意見？」汪要他去職可以直說，何必說些「遠於事實」的話？並稱，從九一八以來，就將個人身家性命置之度外，去留算什麼，只是身負地方治安責任，「去留頗難自由」，他可以「準備交代」，但「絕不能拂袖引去，而危及治安」。<sup>2</sup>

張以華北治安為由，原無立即辭去之意。然盱衡情勢後，8日，決意辭職，「以示無反抗中央之意」<sup>3</sup>，以免反張者乘機攻擊。至於華北的安危問題，張電蔣介石（時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速派大員接掌，並表示「一切無不唯命是從」，以早定局面。<sup>4</sup>但張並不想背負「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的惡名下台，辭職的同時，他電汪表示「自衛必先準備，準備非財莫舉」，「凡有籲請，均為自衛所必需」，「非良個人之請求」，並一一駁斥關於索款各條的

\* 國史館助修

<sup>1</sup> 汪精衛致張學良電（1932年8月6日），收於畢萬聞主編：《張學良文集》，第1冊（北京：新華出版社，1992年），頁605。

<sup>2</sup> 就汪精衛來電的談話（1932年8月6日），《張學良文集》，第1冊，頁604。

<sup>3</sup> 張學良決定辭職，或受胡適7日來函勸告之影響。參沈雲龍輯註：胡適與張學良來往書信（民國21年8月7日），收於《傳記文學》，第41卷第6期，頁36。

<sup>4</sup> 致蔣介石電（1932年8月8日），《張學良文集》，第1冊，頁608。

說法。最後則強調自己「奉命守土，從來一維中央之意旨是遵」，如因在職，「有礙於內政或外交之進行，自當立時引退」，絕不戀棧。<sup>5</sup>

沒想到，張的一句「自衛必先準備，準備非財莫舉」，惹來汪更大的怒火。汪云，張治下的河北、熱河、察哈爾等省，一切國家稅收，悉被截留。「一旦疆場有事，中央責以防禦，則請餉之電，來如雪片」，「請而不遂，則一切責任歸之中央」。「今日而欲抵抗強敵，唯一辦法在打破各省軍人割據之局面，使中央能聚全國之財，運全國之兵，以為全國爭存亡」。因此，汪希望中央能免去張職，「以為打破軍人割據局面之發軔」<sup>6</sup>，同時，建議何應欽或朱培德接任；並力陳對蔣不存意見，表示並無個人恩怨私心。

面對汪再次的指控，張當夜接見新聞記者，滿腹委曲地說，「余現在所處之境，上有婆婆，下有兒女」，「向中央請款，中央可以延緩，部下向余請款，則不能不負責籌措」，而且「華北政治軍事教育，及東北災官災民、失業學子，無處不需款辦事」，每次發餉，也必先籌劃龐（炳勳）宋（哲元）等部的軍餉，然後才顧及東北軍。此中艱辛，為顧全國家體面計，不願盡行披露。最後，聲淚俱下地說「假如不因愛國二字，張氏父子無今日之結果」。<sup>7</sup>翌（9）日，張針對汪指控各點，提出聲明，表示凡事依據政府規定和命令行事，皆有案可考，汪一查便知；同時，公開之前向中央請款的往來文電，讓人明瞭事實真相。<sup>8</sup>於是，四天以來的唇槍舌劍，暫告一段落。

從以上汪張交鋒的過程中，可以發現：

- 一、整體而言，爭論的焦點集中於汪指控張「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之事，是否屬實？汪重點在斥責張「不抵抗」的行為；張則著重於澄清所謂的「聚斂」之事，對汪斥其「不抵抗」的指控，僅以「維中央之意旨是遵」一語帶過。而汪提出「打破軍人干政截稅之局」的說法，雖是隨張起舞之後的事，但從其激動的陳辭中，多少可以看出汪對軍人干政的深惡痛絕，及其主政後的窘境。
- 二、汪之所以選擇張為攻擊對象，就汪所言，是因為張是中央以外，擁兵最多，軍容最盛者，而敵兵所擾，正在其防地之內。所以，就實力、職責、地利各方面來說，只要張在職一日，抵抗敵人，絕非他人所能越俎。<sup>9</sup>既然張不想抵抗，為了國家安全計，汪只好

<sup>5</sup> 復汪精衛電（1932年8月8日），《張學良文集》，第1冊，頁606-607。

<sup>6</sup> 汪精衛致中執會駁張電（1932年8月8日），《張學良文集》，第1冊，頁608-609。

<sup>7</sup> 對北平報界之解釋（1932年8月8日晚，北平順承王府），《張學良文集》，第1冊，頁610-611。

<sup>8</sup> 對新聞記者談汪精衛齊電（1932年8月9日晚，北平順承王府），《張學良文集》，第1冊，頁612。

<sup>9</sup> 汪精衛致張學良電（1932年8月6日），《張學良文集》，第1冊，頁605。

以自己辭職為賭注，公開驅張。也就是說，汪已經認定張不可能抵抗的事實，所以才會出此下策。然而，如果張確不遵中央號令，中央儘可以明令免職懲辦，為何汪要用自己辭職的方式來勸退張？

三、張之所以認為汪「公報私仇」，在於汪所言「遠於事實」。因為張自認並無「聚斂」之事，而「奉命守土，從來一維中央之意旨是遵」。他願意依汪所請下台的唯一理由是，「倘以為如良在職，有礙於內政或外交之進行，自當立時引退」。然此言顯然是一種意氣的「質問」，而不是真心的「反思」。因為張既然自認「從來一維中央之意旨是遵」，那他為何會「有礙於內政或外交之進行」？究竟是誰的內政？誰的外交？說到底，他還是認為自己是因為無法滿足汪個人的政治野心，而遭其報復。

四、如果汪所言是事實，張為何「不想抵抗」？不是「個人身家性命，均早經置之度外」嗎？還是另有隱情，不得不然？而張若真不想抵抗，為了國家安全計，當時負責全國國防軍事的蔣介石，何以坐視張任意妄為，悶不吭聲？難道蔣汪在「中央政策」的執行上有分歧？又，如果張的「不想抵抗」是蔣所默許的，那汪「反張」是否為了「制蔣」？相反地，如果張所言是真的，那汪既滿懷野心，又怎會為了個人恩怨，而賠上自己的政治生命？難道汪有別的企圖？或者他對局勢的發展有十足的把握，相信自己不會因此而下台？那他的籌碼是什麼？

據上所析，引發這次事件的關鍵，除了汪張個人的恩怨外，應該與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抗日局勢的發展有關；而蔣，於公（與汪在中央的政治合作），於私（與張在地方的軍事合作），都脫不了干係。

過去有關汪張交惡一事的探討，通常是在論述其他問題時附帶提及，具體以事件本身為主題的研究，為數甚少，議論的焦點則在：汪為什麼要發動政潮？又為何選擇張學良為攻訐的對象？以目前的研究觀點來說，學者普遍認為引發這次政潮的根本原因，在於蔣汪二人亟欲「主掌全局」的矛盾激化；而選擇張為引爆點，則是因為蔣張之間的「特殊關係」，以及汪張之間的「舊怨新仇」。<sup>10</sup>換句話說，汪是為了與蔣抗衡，才把張學良當「靶子」的。當然，也有人認為純就蔣汪矛盾，和汪張之間「個人恩怨意氣」來理解汪張互訐的意義，未免失之膚淺，而低估了汪在「對日問題」上的認真與急迫態度。<sup>11</sup>但是，以汪張互訐電文所

<sup>10</sup> 請參王軍：《張學良與1932年南京政潮》，《中國現代史》，1993年第5期，頁176-180；張同新編註：《蔣汪合作的國民政府》（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51；蔡德金：《汪精衛評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205。

<sup>11</sup> 王克文：《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權》（臺北：國史館，2001年），頁190-191。

呈現的問題，對照目前的研究論點，有幾個問題是必須重新審思的：

- 一、汪因應時局的想法和態度：汪是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探究他所處的局勢和思考模式，應該是了解事件原委的最佳方法。僅僅強調汪在對日問題上的認真與急迫態度，顯然是不夠的。而將汪張之間的問題，完全歸諸於蔣汪「領袖情結」的權力鬥爭，則過於簡化，無形之中也忽略了其他可能的因素。所以，回歸到汪個人的想法和應對，是有必要的。
  - 二、蔣汪張三人的抗日理念：「抗日救亡」是當時民眾心中最重要的問題，也是蔣汪合作重組政府的要因，更是汪此次攻訐張的重點。但是以往的研究，只是從整體對日方針的角度去思考，認為唯有張的「一面抵抗」，才能為汪的「一面交涉」製造形勢和增加籌碼。<sup>12</sup>事實上，從汪張互訐的內涵來看，汪的重點是「要不要抵抗」，而張的問題卻在「能不能抵抗」。夾在兩人中間的蔣，其抗日態度如何，自然對兩人的行動，有相當程度的影響。所以，想要進一步理解事件背後隱含的問題，必須對三人的抗日理念加以剖析。
  - 三、隨著上述二方面的再探討，有關蔣因應此次事件的方針和態度，自然必須重新評估，否則仍以權力爭鬥為唯一的衡量標準，則失去再探討的意義。
- 以下即針對這三個議題，逐步探究事件的來龍去脈，及背後所隱含的各種意象。

## 貳、亟欲「打破事實」<sup>13</sup>的汪兆銘

所謂「兄弟鬩牆，外禦其侮」，在上海「一二八」(1932年)的砲火下，蔣汪的合作，可以說是局勢使然。緣此前蔣在「九一八」「團結禦侮」的制約下被迫去職，已無單槍匹馬上台的可能；而寧粵和談期間，胡漢民與陳濟棠等粵派人士對汪派「去皮存骨」<sup>14</sup>的做法，也使汪決定棄胡就蔣。雖然陳公博指出，蔣汪二人在性情、脾氣上完全不同，表面客客氣

<sup>12</sup> 王克文：《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權》，頁191。

<sup>13</sup> 按汪於1930年5月間曾發表「不切事實」一文，強調對當時的軍政現狀，應勇於「打破事實」，而不是「遷就事實」。該文收錄於《汪精衛先生最近言論集》(香港：南華日報社，民國19年)，頁195-205。

<sup>14</sup> 參李鐸、汪瑞炯、趙令揚編註：《苦笑錄：陳公博回憶(1925-1936)》(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頁265-266。

氣，暗中卻互爭領袖，根本無法合作。<sup>15</sup> 但是，能不能合作是一回事，不能不合作又是一回事。蔣汪既然決定合作，自然有各自的考量和亟欲活動發展的舞台。

對蔣而言，拱汪出來，主要是為了聯合制止孫科政府的「對日絕交」議案，<sup>16</sup> 和避免所謂的「獨裁復活」的紛擾。基本上，蔣認為汪「為人意志薄弱，狐疑多端，又好恃聰明，乘機取巧」，並非成大事之才，但為了救亡圖存，只有不顧一切，把汪拱上行政院長的位子，自居幕後，不受名位，竭誠相助。<sup>17</sup> 然蔣以私人資格，贊助政府，無權無位，自易招人懷疑。對此，蔣雖感悲痛委曲，卻以「大丈夫能屈能伸」自勉，也深信自己就是力挽狂瀾的中流砥柱。<sup>18</sup> 蔣這種「捨我其誰」的自信，以及承擔責任的能耐，多少和他能實質掌控政局的軍事背景有關。畢竟，這還是一個槍桿子出政權的時代。

相較之下，汪身為文人，沒有軍事背景做後盾，他所能憑藉的，除了廣結同盟以外，就只有「民眾的勢力」了。<sup>19</sup> 前者的結合，通常是政治利益掛帥，變動頻繁，極不穩當。後者，是走「群眾運動路線」，具體到現實層面，指的是「輿論的力量」，這才是汪在政治舞台上翻雲覆雨的主要籌碼。九一八事變後，汪就是靠著個人翩翩動人的風度、富於煽動性的口才，及言之成章的一支筆，利用媒體製造輿論，成功的將自己塑造成堅持「民主政治」的國民黨領袖，從而有出仕的機緣。<sup>20</sup> 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汪既然利用媒體輿論，成就個人的政治聲望，相對地，就必須對自己所製造的輿論負責。因此，汪在這個時期所發表的政治主張和言論，自然成為他執政後的政策指標。

<sup>15</sup> 李鐸等編註：《苦笑錄：陳公博回憶（1925-1936）》，頁327。

<sup>16</sup> 蔣入京前，曾向汪兆銘、孫科表示：「余不入京，則政府必貿然與日絕交，絕無通盤計畫，妄逞一時血氣，孤注一擲，國必亡滅。故余不顧一切，決計入京。」《蔣中正總統檔案·文物圖書·事略稿本》（以下稱《蔣檔·事略稿本》），民國21年1月19日條，國史館藏。

<sup>17</sup> 蔣原主張孫科主政治，汪兆銘主黨務。然汪之意以為僅管黨務，尚嫌不足；而孫科在無力打開僵局的情況下，辭職而去，蔣只好推汪為行政院長。參《蔣檔·事略稿本》，民國21年1月21、23、26日條。

<sup>18</sup> 參《蔣檔·事略稿本》，民國21年1月30日、3月12日條。

<sup>19</sup> 汪認為文人与「不正當勢力」奮鬥時，必須憑藉革命的民眾勢力和革命的武力。然當時汪顯然無法掌控武力，似乎也只能依恃民眾勢力了。參汪兆銘：《怎樣做文人》，《汪精衛先生最近言論集》，頁221。

<sup>20</sup> 有關汪的個性及利用媒體創造輿論的問題，可參閱陶菊隱：《汪精衛這個人》，《中外雜誌》，第20卷第4期，頁60-67；李國祁：《從個性談汪精衛的歷史功過》，《歷史月刊》，第68期，頁77-93；許育銘：《汪兆銘與國民政府：1931至1936年對日問題下的政治變動》（臺北：國史館，民國88年），頁53、61-63。

整體而言，汪當時主要政論在於：集中全國力量，對內求民主政治的實現，對外籌商共赴國難之方。汪認為數年以來，黨國之所以不團結、不統一，全在於民主政治之未能完成；唯有政治上做到軍政分開，使政治脫離軍權的支配，內固國本，才能外抗強權。<sup>21</sup> 換句話說，汪認為因應時局，必須先改革「以軍領政」的問題，然後才能集中全力對抗外侮。至於共赴國難之方，汪主張召開國民救國會議，表示「言戰，固須全國人民一致犧牲；言和，亦須全國人民一致忍辱負重」，並以此會議代表民意機關，樹立民主政治之基礎。<sup>22</sup> 此外，對於時局所關注的對日問題，汪鑒於「九一八」不抵抗的教訓，又感於中國國力之不足，在和戰兩難的情況下，力主「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上述主張可以說是汪在國難期間的民主政治藍圖，但也透露出汪「對日和戰取決於輿論」的心態。這種心態，說是「博採眾議，廣納賢言」，可；說是「缺乏自信，逃避權責」，亦無不可。總之，汪意圖依恃輿論行政的心理，是顯而易見的。不過，汪也明白他的政治藍圖——不論是政制改革，或外抗強敵，都和蔣的軍事節制有關。

對於蔣的軍事實力，汪是看重的。他深知：孫科的新政府正是欠缺蔣的軍事支持，才會在一個月內垮台；而他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針，也需要軍事力量做後盾。所以，直到蔣確定外交方針為「積極抵抗，預備交涉」時，汪才應允出任行政院長。<sup>23</sup> 事實上，汪入京，又出掌政院，已失去胡漢民等人的諒解。<sup>24</sup> 在這種情勢之下，汪也只能爭取蔣的支持，以貫徹政策的執行，贏得民眾的肯定和信任，從另一側面取得政治的憑藉。當然，於公於私，汪也不願意再出現蔣軍事獨裁的局面。一面要蔣的軍事支持，一面又要限制蔣對軍事的統馭，自然影響到汪對政策執行的決斷力。

「淞滬戰役」是汪執政後，第一個要面對的難題。為了確立長期抵抗的決心，汪就職當天（1932年1月29日）主持中央政治會議（以下稱「中政會」），即決議設立軍事委員會，以蔣等為委員；並決定依蔣之建議，將政府遷往洛陽辦公，以免受敵軍威脅，形成「城下之盟」的態勢。翌日，除何應欽留守維持治安、羅文幹主持外交外，其餘人員均渡江北上。途中，汪撰文、演說，不斷地解釋政府遷洛的原因和此後的對日方針，扮演著宣傳、溝通的角

<sup>21</sup> 《大公報》，民國 21 年 10 月 22、28、30 日。

<sup>22</sup> 國難會議與國難，《大公報》（天津），社評，民國 20 年 12 月 13 日。

<sup>23</sup> 《蔣檔·事略稿本》，民國 21 年 1 月 28 日條。

<sup>24</sup> 寧粵和談期間，汪兆銘與胡漢民曾相約一致行動，因此，當胡漢民見報得知汪出任行政院長，大為憤慨，斥汪不守信用，沒有道義。參程天固：《程天固回憶錄》（香港：龍門書店，1978年），頁 236；陳錫璋：《廣州樞府史話》（臺北：黎明文化公司，民國 68 年），頁 248。

色，以爭取各方的諒解和支持。

當時的汪，意氣風發，他覺得「國民憤日與救國之熱情，已達極點；對主張不抵抗者，嫉之尤甚」，因此建議南京中央迅速定計：

- 一、決定澈底抵抗政策，毋再游移，即宣示國人，全力禦侮；
- 二、萃海陸空軍力量，固守上海，予十九路軍以充分援助；
- 三、令北方各軍乘機向關外反攻，收復失地；
- 四、外交方面，提出非日兵全部撤退不即交涉，上海問題當與東三省問題，同時解決。

汪認為，以上四項若能實行，則士氣百倍，堅持下去，國際必生變化，然後才有外交可言。<sup>25</sup> 換言之，汪的積極抵抗，是為了引起國際注意，促使國際干預、交涉。據此，抵抗的基本原則，首在「正當自衛」，軍事上嚴戒挑釁行為。<sup>26</sup> 所以，汪雖然公開呼籲「處處抵抗，人人抵抗」，私底下甚至主張「四處挑釁，唯亡國，亦所不惜」，<sup>27</sup> 也無法改變軍事上被動、受制於人的格局。而口頭上的抵抗、輿論的支持，畢竟還是敵不過源源而來的日軍，3月2日，戰事前線的十九路軍和第五軍，在後繼無援的情況下，撤退到第二道防線。

增援部隊不到，是十九路軍敗陣的關鍵，也是政府受人抨擊的緣由。<sup>28</sup> 審視援軍不到的原因，除了戰事初期，因避免擴大事端心態，而延誤增援時機的因素外，江南蔣鼎文師因剿共軍事，難以抽身；江北胡宗南、上官雲相等師，因敵艦封鎖長江，渡江不易；四川則是因軍費問題，以及蔣汪意見不一，決定不出兵；而廣東在接到「出兵贛南」的電令時，竟然

<sup>25</sup> 汪兆銘為政府遷洛辦公致唐紹儀蕭佛成等電（民國21年1月31日），《革命文獻》，第36輯（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頁1568。

<sup>26</sup> 蔡德金、王升編著：《汪精衛生平紀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1932年2月7日條，頁168。據云，十九路軍在淞滬戰役中，幾乎只是消極地守衛自己的防線，等待敵軍來攻，求得在原来的陣線上擊退敵人的進攻，保住自己的地盤。即使反擊，也只是將敵人逐出自己的陣線和據點，恢復原來的態勢。而且礙於公共租界的關係，從未主動出擊，摧毀敵軍在陸上的根據地。余子道：《抵抗與妥協的兩重奏——一二八淞滬抗戰》（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193。

<sup>27</sup> 汪兆銘：政府對日方針（民國21年2月15日），《革命文獻》，第36輯，頁1571；《蔣作賓日記》（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1932年2月15日條，頁410。

<sup>28</sup> 當時留滬的中央委員即電責蔣、汪：「不願增援致滬失陷，誤國之咎何能同負。」而各界團體、報館亦致電政府，催派援兵，言辭激宕。參《大公報》，民國21年3月4日，版4；汪兆銘致吳鐵城函（民國21年2月16日），《革命文獻》，第36輯，頁1573-1574。

按兵不動。此外，張學良也未能配合汪的意願，出兵熱河，牽制關外日軍。<sup>29</sup> 以上諸多原因，除日軍外來因素不可預測外，共軍問題、財政問題、地方軍人割據問題，乃至部隊將領和輿論所提出的統一指揮問題，<sup>30</sup> 事實上都是屬於中國內部自身的問題。這些問題，讓汪再度感受到「內政革新」的重要。

3月上旬，國民黨在洛陽召開四屆二中全會，汪即抓住問題核心，提出施政方針：軍事方面，切實施行全國防衛計畫；以國防為主目的，剿匪為副目的。外交方面，運用國際組織及條約，使盟約國干涉日本的侵略行動；對日交涉，決不屈服於喪權辱國的條件。財政方面，實行財政公開，成立財政委員會。<sup>31</sup> 政治方面，從速實行「現役軍人不得兼任政務長官」的規定。<sup>32</sup> 在確立以上方針後，汪力排眾議，推舉蔣為軍委會委員長，全權負責國防軍事。不過，為防止政治又被軍事支配，會議上還是明文修定軍委會的任務在「抗日」，對日問題一解決，即行撤銷。<sup>33</sup>

汪堅持以蔣為委員長，是基於實際的軍事需要和輿論的要求，他明白這麼做，將失去胡漢民、孫科、馮玉祥等反蔣派的期望和支持，但汪認為胡等只是害怕蔣的軍事獨裁，只要他秉持一貫的主張，打破「以軍領政」這個事實，然後「以國防為主目的」，全力對外，應該可以化解一切。<sup>34</sup> 因此，四屆二中全會後，汪不惜以「去就」相爭，堅持短期內實施「現役軍人不得兼任地方政務長官」的規定，以革除地方軍人割據的弊端。據此，各地方大員相

<sup>29</sup> 參 淞滬自衛作戰經過報告書，《蔣檔·特交檔案》，中日戰爭第14卷—淞滬抗戰；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臺北：綜合月刊社，民國62年），頁104；上海杜品崢致成都劉文輝冬電（民國21年3月2日），《閻錫山檔案·各方往來電文錄存》（以下稱《閻檔·各方往來電》），微捲第61捲，國史館藏。

<sup>30</sup> 據云，蔣光鼐、蔡廷鍇等人認為時局緊急，軍事提挈，不可領袖無人；而輿論也表示，「最高之軍略政略，必須由惟一之源泉發動」。參 蔣中正電宋子文，《蔣檔·事略稿本》，民國21年2月2日條；軍事與外交，《大公報》，社評，民國21年2月16日。

<sup>31</sup> 財政方面，據說為宋子文把持，不僅用人專斷，連政策也是秘密的。汪之主張財政公開和成立財政委員會，多少有針對宋的意味。參李鐸等編註：《苦笑錄：陳公博回憶（1925-1936）》，頁328。

<sup>32</sup> 中國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中之施政方針報告（民國21年3月4日），《革命文獻》，第36輯，頁1584-1585。

<sup>33</sup> 四屆二中全會關於軍事委員會之決議案，《國民政府軍政組織史料》，第1冊（臺北：國史館，民國85年），頁43。

<sup>34</sup> 當汪提出委員長的提案時，陳公博曾請汪慎重，但汪說「我死也要這樣做」；而且自認為已在孫科等輩的排出之列，所以決定「今後只有不顧一切努力去做」。參李鐸等編註：《苦笑錄：陳公博回憶（1925-1936）》，頁336；《蔣檔·事略稿本》，民國21年3月6日條。

繼提出辭呈，但反汪聲浪也隨之而來，認為這是汪派搶奪政權的一種陰謀。<sup>35</sup> 在此一情勢下，汪對蔣控制下的鄂、豫、皖等省毫不猶豫的改組，但對半獨立的區域則持保留態度，這種差別待遇，自然也引起蔣系軍人的不滿。

事實上，鄂、豫、皖能夠順利改組，還是因為蔣的指示配合。<sup>36</sup> 只是，舊主席成了「綏靖主任」，仍然掌控地方軍政，不過添了一個非現役軍人的主席，並無實質上的助益。可見，打破現制障礙甚多，文人能否支配，在在均成問題，加上國防吃緊，汪最後也只能以「審慎緩辦」為由，實施所謂的「柔和政策」，<sup>37</sup> 為自己找台階下了。不過，汪並沒有因此而氣餒，4月7日，籌備了三個多月的「國難會議」在洛陽熱鬧登場。

國難會議召集的目的，根據其組織大綱，是為了「集中全國意志，共定救國大計」。既說是「救國大計」，當然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乃至制度面等問題。然當時由於「取消黨治」之說，盛倡南北；而蔣持相反意見，堅決反對「開放黨禁」。<sup>38</sup> 為免去不必要的紛爭，汪將該會的職權設定在「禦侮、救災、綏靖」三項。為此，不僅主張「取消黨治」的一大批會員拒絕到會，報章雜誌也提出質疑。結果，會議上除了決議「共同禦侮」的原則外，政治制度的改革、軍制的改革、整飭軍紀、推進地方自治等等，林林總總，應有盡有，會員忙於討論、通過。至12日閉幕，一場熱鬧，煙消雲散。會議自會議，國難自國難，什麼也沒改變。<sup>39</sup>

平心而論，汪原本也想利用會議，取消黨治，促進憲政，以改造當時的政治局面。然蔣對國難會議的態度與汪不同；而行政院本身，外交部、軍政部、財政部的看法也不一；臨時雜湊的國難會議，委員數百（到會百餘人），職業異，黨派異，心理慾望、思想感情，皆不盡相同；甚者，有人認為會議的用意，不過是要找人替政府「分謗」，如此會議，想要共定大計，談何容易？或許就如與會學者所言：「個人想不出辦法來，而望把想不出辦法的個人集在一處，就能想出辦法來——這豈不是夢想？」不過，汪在會場上的演說和誠懇的表現，倒是替他贏得了「天生的民眾領袖」頭銜。這也讓汪再次確認，自己的政治生命是須靠與民眾

<sup>35</sup> 上海邵漢祥致重慶劉湘篠電（民國21年3月17日），《閩檔·各方往來電》，微捲第61捲。

<sup>36</sup> 參 漢口何成濬致貴陽王家烈軍電（民國21年3月13日），《閩檔·各方往來電》，微捲第61捲。當時的蔣，專注於軍事的整理，對於政治持放任態度，只希望國內不要再有紛爭。

<sup>37</sup> 參許育銘：《汪兆銘與國民政府：1931至1936年對日問題下的政治變動》，頁178；汪兆銘：上海停戰撤兵協定之經過，《革命文獻》，第36輯，頁1607。

<sup>38</sup> 《蔣檔·事略稿本》，民國21年3月28日條。

<sup>39</sup> 參 國難會議與誠信問題，《大公報》，社評，民國21年4月1日；張梓生：半年來的中國，《申報月刊》，第1卷第1號（民國21年7月15日），頁159。

接近的。<sup>40</sup> 但是，一個月後的「上海停戰協定」，卻讓汪栽了跟頭。

淞滬戰役自3月上旬停戰後，歷經月餘的談判交涉，終於在5月5日簽訂「中日上海停戰及日方撤軍協定」。<sup>41</sup> 對此，有人肯定汪積極負責的態度，認為是政府的一大進步；但多數的軍民卻無法容忍在上海重大犧牲後，竟然「除戰鬥停止一點外，一切未決」，紛紛譴責政府；而兩廣方面，則指稱「苟非喪權辱國，何以必要絕對秘密，急行簽字」，試圖以此顛覆中央。<sup>42</sup> 在全國輿論沸騰的情況下，汪一再解釋停戰協定不含政治條件，與東北的繼續抵抗可以同時並行，並無喪權辱國之舉。<sup>43</sup> 但21日，監察院長于右任卻以「停戰協定未經立法院通過」為由，彈劾汪的行為違法，呈請依法懲戒。

「彈劾案」一出，一股反汪浪潮襲擊而來，雖然二天之後，中政會就以「行政院是依中政會的決議辦理，手續上並無不合，沒有討論懲戒的必要」結案，但汪的聲譽已大大受損。為此，汪一面大罵于右任不應彈劾，不配彈劾，聲言辭職；<sup>44</sup> 一面在報章上陳述事情經過，為自己辯白。最後，由於媒體指出，不應在內憂外患之際，激成政潮，形成無政府狀態，或恢復類似去年的分立局面，此事才稍漸平息。<sup>45</sup> 當然，原先試圖與上海方面聯手反對中央的兩廣，因內部統一軍權問題，陷入二陳（陳濟棠、陳策）的糾紛之中，無力加入反汪戰場，也是事件不致擴大的原因之一。<sup>46</sup>

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先是3月9日「滿洲國」在長春成立；5月11日日方又自動宣布一個月內盡撤在滬之軍，這當然是協定簽訂時，一般所始料未及的。但幾乎在日本撤兵的同時，山海關的局勢突然緊張起來；而日本5月政變以後的聯合內閣與議會，也公然討論承

<sup>40</sup> 國難會議與誠信問題，《大公報》，社評，民國21年4月1日；蔣廷黻：參加國難會議的回顧，《獨立評論》，第1號（民國21年5月22日），頁10、12。

<sup>41</sup> 據當時中國的談判代表郭泰祺所云：停戰談判中，一面受黨內外的責難；一面受日本人的要挾；一面更須受第三國的壓迫，至為苦痛，實所難堪。上海圓桌會議問題，《大公報》，社評，民國21年5月22日。

<sup>42</sup> 參胡適：上海戰事的結束，《獨立評論》，第1號，頁9；上海停戰協定簽字，《大公報》，社評，民國21年5月6日。關於粵方和留粵中委等的反對電文，請參《申報》，民國21年5月10、17日。

<sup>43</sup> 參汪兆銘：上海停戰撤兵協定之經過，《革命文獻》，第36輯，頁1606。

<sup>44</sup> 參《蔣作賓日記》，1932年5月23、24日條，頁439。

<sup>45</sup> 孟真：監察院與汪精衛，《獨立評論》，第4號（民國21年6月12日），頁2-5；蕭佛成等之宣言，《大公報》，社評，民國21年5月12日。

<sup>46</sup> 有關二陳的糾紛，請參《蔣檔·事略稿本》，民國21年6月25日條；張梓生：半年來的中國，《申報月刊》，第1卷第1號，頁161-162。

認「滿洲國」的時機。很明顯地，日本是想全力把持滿洲，才會迅速撤去上海的軍隊。反觀中方，上海停戰後，南京便忙於剿共軍事的策劃、進行，蔣更進一步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對於華北，可以說是以「和平維持現狀」為政策，不僅不作出關的戰備，而且不防津東日軍的挑釁。這些看在民眾的眼裡，不免要質疑政府：為何剿共可以調動大軍，而抗日不能調動勁旅？為何剿共可以「快做」「硬做」「實做」，而抗日卻遷延半載有餘？為何至今還未確立對日的新方針？<sup>47</sup>

事實上，上海停戰後，東北形勢依然嚴峻，汪是知道的，也明白「對外抵抗，應處主動地位，而不應處於被動地位」。但「滬戰無援，誤在共黨」，「匪患一日不除，政府一日不能專心對外」，這也是事實。<sup>48</sup>而且，所謂的「長期抵抗」，也不是單靠武力，所以汪對蔣專意剿共，基本上是認同的。只是，蔣手中掌握的精銳部隊，既集中於「安內」，則「攘外」所需的武力，勢須仰賴雜牌的地方軍。這些雜牌軍的戰鬥力既不高，對南京中央的效忠程度也有問題。<sup>49</sup>這一點，汪不是不知道。而他之所以放心這麼做，一是評估剿共軍事短期內可徹底終結；二是認為華北軍政由張學良統籌負責，以蔣張過去的合作關係，只要和蔣商定策略，應能掌握張的動向；三是當時國聯調查團正在中國，他相信日本多少有些顧忌，不致大舉來侵。因此，這時候的汪，其實只是想透過蔣指揮張，在可能的能力、範圍內，做出恢復東北的動作，打破「攘外」被動的形象，以爭取國聯的同情、平緩民眾激憤的情緒，和挽回自己的聲譽。沒想到，情勢變化，竟惹起另一波政潮。

### 參、同步不同調的抗日理念

華北局勢的惡化，其實是意料中的事。因為「滿洲國」成立的時候，就已經公然地將熱河劃為其中一省。而日軍之急於動作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為了解決關外東北抗日義勇軍的問題。按理說，在東北的日軍和「滿洲國」的軍隊，少說也有十幾二十萬，以這樣充足的武力，配備精良的槍械，對付給養困難及系統雜亂的義軍，應該是綽綽有餘了。但是，情形卻非如此。分析其中原因：一是民眾反日情緒高漲，「滿軍」不肯真心打仗，而義軍人數增加

<sup>47</sup> 參 近日之山海關、對日新方針之確立與進行，《大公報》，社評，民國21年5月13、31日；華北風雲緊急之謠傳，《申報》，時評，民國21年7月5日。

<sup>48</sup> 《申報》，民國21年6月10、15日。

<sup>49</sup> 王克文：《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權》，頁189。

又遠超過於作戰死亡數，致使日軍無法應付；二是日軍戰線過長，軍力不敷分配；三是日軍擅長以步騎砲空聯合作戰，不長於單以步兵作戰，因而對義軍乘間抵隙的游擊作戰方式甚感疲於奔命。這三種原因，使日軍只能不斷派遣大軍，作廣大持久的武力鎮壓。而這樣的持久戰，卻是日本的經濟狀況和政治形勢所絕不允許的。<sup>50</sup> 因此，日軍急於切斷關內武器資源及抗日人員的進出，對於東北的南大門—山海關（一名榆關）和熱河，也就勢在必得了。

日本的企圖和野心，不論是統籌全局的蔣、汪，或是負責華北軍政的張學良，乃至對局勢稍有認知的各界人士，都可以輕易地看出來。問題是，日軍會先取山海關，直接威逼平津地區？還是先進軍熱河，完成「滿洲國」的版圖？即中國在有限的兵力下，應以何處為防衛重心？

一般而言，熱河在關外，平津在關內，若保有關外這一大片土地守護關內，平津即使失去也是暫時的，想再奪回並不難；但熱河若失去，和東三省連成一氣，就沒那麼容易恢復了。而且，日軍取得熱河後，不但可以兼收鴉片，聊充軍費，解決滿洲國的財政問題；又能俯視平津及華北，為進一步奪取察哈爾、綏遠，染指河北、山西，創造有利的條件。也就是說，熱河一旦失去，關內各地也岌岌可危。其次，以攻防戰略來看，一般以為，熱河多山，易守難攻；而平津由於地理位置，日軍可以從秦皇島或天津上岸，死守山海關或灤河一線並無助益，何況從山海關到天津、北平，都是平原曠野，日本的飛機、坦克、重砲均可使用，根本防不勝防。因此，蔣、汪的防衛標的是放在熱河上。

然而，當時主熱者係東北元老湯玉麟，不僅販賣煙土，剋扣軍餉，視熱河為其私產，傳言與「滿洲國」互通聲息，而且自恃為張學良的父執輩，不受張的節制和中央的號令，幾乎形同獨立。所以，蔣、汪等人在6月中旬的廬山會議中，<sup>51</sup> 決定命張學良先解決湯玉麟，佔領熱河，一來可以與東三省各義勇軍打成一片，二來可以威脅山海關的日軍，使其不敢進窺平津。蔣並手書致張學良函交汪，囑張照此計畫實行。<sup>52</sup> 關於這個計畫，過去因資料來源是「蔣的日記」，所以認定是蔣提出的。但從汪等自廬山返京所云，「所擬辦法已得介石（蔣）完全贊同，並有親手書致漢卿（張學良），囑其照行」<sup>53</sup> 來看，應是汪等事先研擬，然後與蔣商議決定的。可見汪當時確想打破華北現況，另創新局。

18日，汪即藉北上與國聯調查團會晤的機會，和張學良研商防守熱河的問題。沒想

<sup>50</sup> 陳清晨：東北義勇軍之考察，《申報月刊》，第1卷第3號（民國21年9月15日），頁29。

<sup>51</sup> 按赴廬山者，除汪外，有顧維鈞、羅文幹、李文範、李石曾、黃紹竑等人。

<sup>52</sup> 《蔣檔·事略稿本》，民國21年6月15日條。

<sup>53</sup> 《蔣作賓日記》，1932年6月17日條，頁445。

到，這一會面研商，雙方便鬧得不愉快。根據張的回憶，事情的經過是這樣：

見面之後，(汪)出示蔣委員長親筆函，大意是汪院長來平，為對日軍事問題，同我相商。談詢之下，汪表示政府打算在華北對日本有用兵之意。我遂詢問，政府是否具有堅決的決心，有無相當的準備。汪答曰：「不是那個樣子的事，是因為政府受到各方的言論攻擊，希望你對日本作一個戰爭姿態，小加抗拒，致於勝敗則所不計也，乃是在政治上可以應付輿論之指責也。」我聆聽之下，驚訝憤慨，遂即答曰：「政府既無準備和決心，擬犧牲將士之性命，來挽救延續政治之垮台，我不取也。」汪遂曰：「這是蔣委員長的意思。」我說：「若說是蔣委員長的意思，蔣委員長他是我的長官，他會直接給我下命令的，他不會寫信說汪先生你來同我商量。既然是說同我商討，這種並不是真正的抗戰，而是拿人家的性命，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的辦法，我的表示是決不贊同。」汪呈不悅之色，乃言曰：「我以行政院長的身份，親來同你商量，那末同蔣委員長命令，又有什麼分別哪？」我說：「命令是命令，我服從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命令，那是我軍人的職份。至於命令所作的事，我只是執行，我不負道義上的責任。商談是商談，我不計較什麼行政院長的身份，為了政治上的利益而犧牲我部屬的生命，我良心上是作不下去，我決不敢苟同。汪先生你如果一定要那麼辦，請你回京請蔣委員長下命令罷了。」<sup>54</sup>

汪原本以為有蔣的親筆函，就可以讓張依計行事，不料張態度如此。從張的言詞中不難發現：一、張所希望的抵抗是在中央有準備、有辦法的情況下施行，是真抵抗，而不是做做樣子；二、在中央未正式下令前，絕不以地方名義自行動作，背負和戰責任。事實上，張會這麼想，也不是沒來由。其一，年初防衛錦州的教訓，中央一紙命令「抵抗」，卻不撥一分糧餉，不發一槍一彈，張及其左右都懷疑是被人出賣了。<sup>55</sup>為此，張曾向左右表示「不為瓦碎」的主張。張說，如果是「玉碎」還可以碎，要是瓦碎則不必。所謂「玉碎」，是指在全國抗戰之下，東北軍全部犧牲，是光榮的；如果只有東北抵抗，東北軍打完則是「瓦碎」，不值得。<sup>56</sup>其二，淞滬戰役之際，汪曾派員北上請救兵，企圖動員張對東北採取軍事

<sup>54</sup> 張學良：《雜憶隨感漫錄》，下冊，頁87-88，收錄於《蔣經國總統檔案》，國史館藏，原編號B0905。

<sup>55</sup> 司馬桑敦（王光逖）：《張學良評傳》（臺北：傳記文學雜誌社編印，民國78年），頁174；劉博崑：《九一八惡夢錄》，《傳記文學》，第9卷第3期，頁14。

<sup>56</sup> 王化一日記輯（1931年12月29日），轉引自張魁堂：《張學良傳》（臺北：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年4月2刷），頁145。

行動，以牽制日軍，然蔣的信使卻早一日到平。其後張僅以「鞏固後方，推進前方，保衛地方，擁護中央」<sup>57</sup>十六字回復中央，這中間究竟是張的「不為瓦碎」思想作意，還是蔣的指示所致，頗耐人尋味。不過，蔣、汪二人在抗日問題上的不一致，卻可見一二。<sup>58</sup>此外，6月初旬，軍委會才電張抽調華北部隊南下剿共，汪來平發表談話也明白表示「現政府決心剿匪，先內安而外可攘」<sup>59</sup>，足見當時蔣的重心在安內。而中央財政困難，又是眾所皆知的事，在這種情勢之下，怎會有攘外的準備和打算？或許這就是張不相信汪說「蔣有對日用兵之意」的原因。

其實就出兵熱河的計畫而言，蔣的目的僅在除去態度曖昧、依違其間的湯玉麟，以爭取防衛熱河的主動性，並無向日本挑釁的意味。也就是說，蔣的想法是「應戰而不求戰」，只是「應戰」之前，必須做好「備戰」的功夫。去湯占熱就是為了爭取有利的形勢，積極「備戰」，以增加「應戰」的籌碼。可是，換成汪的想法，卻成了「應付輿論，維繫政權」了。這個理由，張自然無法接受。正因為汪的意圖是在「應付輿論」，所以即使張已表明不願配合的態度，汪仍對外宣稱：今後外交，「求其在我」，不能再如往昔一樣，依賴他人；「至於收回東北，中央已具決心，曾與張主任談商，張極表贊同」。<sup>60</sup>如此一來，等於是向民眾預告華北即將抗日的訊息，汪勢必得付諸行動。為此，汪一面向蔣告狀，說張無意抵抗；一面急著找人取代張，進行抵抗，以證實自己所宣稱的一切。因此，當汪離開北平，經過濟南時，即造訪韓復榘，勸其出兵抗日。但韓受張節制，不願失去協款，在未取得張的同意之前，也不敢應允。汪因之更加惱張。

有人認為汪對張的敵意，係因「舊怨新仇」所致。即1930年汪主持擴大會議時，張擁護蔣反汪，結果造成擴大會議的流產，使汪失去取蔣而代之的機會；汪出任行政院長後，張又一味聽命於蔣，對汪不予支持。<sup>61</sup>然而，就實際情況來說，政治性的結盟，原本就分分合合，重點在於「眼前能不能合作」，而不在於「過去是不是敵人」，這一點，自稱是「政客」

<sup>57</sup> 參李鐸等編註：《苦笑錄：陳公博回憶（1925-1936）》，頁283；汪兆銘：《熱河問題與共赴國難》，《革命文獻》，第38輯，頁2188。

<sup>58</sup> 按汪傾向於「打了再說」，即先抵抗後交涉；但蔣不贊成孤注一擲，認為「戰」無可戰的條件，「和」則難饜日人之胃口，所以反對擴大戰事，不希望張進兵熱河，也不願川軍北上支援。

<sup>59</sup> 蔡德金、王升編著：《汪精衛生平紀事》，1932年6月18日條，頁177。

<sup>60</sup> 北平華覺明致何成濬皓電（民國21年6月19日），《閩檔·各方往來電》，微捲第62捲。

<sup>61</sup> 請參王軍：《張學良與1932年南京政潮》，頁176-180；張同新編註：《蔣汪合作的國民政府》，頁51；蔡德金：《汪精衛評傳》，頁205。

的汪理應明白。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在「舊怨」，而在「新仇」。不過這個「新仇」的說法，只說對一半。因為就出兵熱河一事來看，張顯然是不受操縱的，連蔣這個軍事強人都不行，何況是文人書生的汪。

張漠視汪的態度，自然讓汪氣憤，但汪真正無法忍受的，恐怕是自己的政治生命，乃至國家未來的命運，竟然受這個自始至終不抵抗，又吸食毒品，精神頹靡不振的人所左右。是以，早在洛陽開國難會議時，汪就指名攻擊張說：「他這個人如配談民主，盧梭會從墓裡跳出來撲擊他；這個人如果也配談抵抗，甘地都會怒髮衝冠！」<sup>62</sup> 此次晤張後，汪不僅認定張沒有抗日的決心，「或許將來還有勾結日人以圖生存之一日」，可以說完全對張失去信心；加上國聯調查團又強烈暗示，「非中國本身對東北有辦法，國聯不易為助」。所以，汪回京後，即決定撤換張，並擬商任命何應欽率兵北上，一面協同抵禦，對熱河、山海關上緊布防；一面整頓北方政治，否則「不能調兵一個，如何收復東北失地」，唯有辭職以去。<sup>63</sup>

對於汪四處說張不是，並以辭職表明撤張決心的行徑，看在蔣的眼裡是：汪不肯安心任事，故意裝腔作勢，所以並不以為意；對汪所商派員協助張之事，也無具體答覆。雖然，蔣在得知張的態度後，也認為張是個「紈褲庸弱之徒」，沒有解決熱河的決心和勇氣，擔心華北局勢將因此更加緊張。但撤張問題，關係北方全局和對日外交，甚至影響中央政局；而繼任人選也是個問題。對蔣而言，在鄂共未剿清以前，維持現狀，避免不必要的政治紛擾，似乎是最好的選擇。<sup>64</sup> 但熱河問題畢竟是此後北方治亂的關鍵，必須從速解決，蔣仍希望張能依計行事，毅然派兵入熱。7月7日蔣電蔣伯誠，建議張採取強制手段，「先派兵三旅，用夜間動作開到熱河附近，使倭與湯皆不及防，一俟我軍接近熱河，再調湯至察省，則湯必遵令，倭亦無法」，並表示「寧可先佔熱河，暫棄平津，亦所不惜」。<sup>65</sup> 隨後，即派張群北上與張面商一切。至此，張應該可以完全確認蔣的意思。不過，張終究未能如蔣所願，拿下熱河。

究竟張對熱河作戰計畫有何顧慮？除前述「不為瓦碎」的心態外，基於現實的考量，張認為在「先安內」的策略之下，「攘外」勢無後援，一旦進兵熱河，平津地區的防務相形空

<sup>62</sup> 司馬桑敦：《張學良評傳》，頁178。

<sup>63</sup> 天津林世則致陽泉蕭仙閣號電 南京王蔭椿致成都鄧錫侯儉電、艷電、東電（民國21年6月20、28、29日；7月1日），《閩檔·各方往來電》，微捲第62捲。

<sup>64</sup> 《蔣檔·事略稿本》，民國21年6月27、30日；7月4日條。

<sup>65</sup> 蔣委員致蔣伯誠七月陽電（民國21年7月7日），《蔣檔·革命文獻拓影》，統一時期第16冊—長城戰役，上冊，頁29-30。

虛，反予日軍趁虛而入的機會（當時已有日軍將於中秋後襲取平津，消滅張根據地的傳聞）<sup>66</sup>；再者，張也沒把握可以順利解決熱湯，而不引起內部紛爭。萬一湯因之投向「偽滿」，則日本獲利，而外患如斯，自相操戈，豈不貽笑中外。<sup>67</sup> 即使幸運地拿下熱河，張對防守熱河也沒多大信心，因為熱河不如想像中的易守難攻，根據何柱國的說法：熱河一路多山地，乍看似乎易守難攻，其實，「山地多，死角也多，容易突破，所以守的方面非有縱深配備不可。但戰線甚長，事實上不可能處處都有縱深配備，因此反而易攻難守」。<sup>68</sup> 與其將軍隊投入沒有勝算的戰場上，不如集中兵力守住既有的地盤。所以，張反倒希望湯玉麟在熱河，能居間起某種緩衝作用。因此，蔣雖有「建議」，張仍猶豫依違，不願貿進，甚者將中央有意撤換之事告訴湯子，以拉攏湯。致使其後湯只要求軍需補充，拒絕增兵熱河，熱河作戰計畫因之更受影響。

當然，影響張在抗日問題上的決策力，除了個人的主觀意識和對戰事本身的利害評估外，還有其他客觀上的原因。其一，1926年國奉鄭州之役，張因憂心戰事，染上毒品；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到處瀰漫了要求堅決抗日的呼聲，張背負「不抵抗」的惡名，忍氣吞聲，在內外煎迫、進退維谷的情況下，消極之至，毒癮更大。所以，意志力和體力都很差，這也是汪瞧不起張的原因之一。其二，九一八事變後，南京政府重組，連帶改變了華北的軍政體系，張從陸海空軍副司令的中央大員，變成地方性的北平綏靖主任。身分不同，處境自然不同，對於各色各類的地方軍隊，張不僅要拉攏、應付，某種程度上也要防範、警戒。因為當時傳聞晉閻（錫山）和魯韓（復榘），都有乘機準備反張的說法。<sup>69</sup> 加上，財政困難，部隊就地籌餉，民怨沸騰；其他部隊又不完全聽命指揮，凡此種種，在在令張不敢輕舉妄動。

就在蔣建議張以強制手段進取熱河的同一天，日方向張提出最後通牒，要求取締東省各地反抗組織的軍事運動，如果張不能保證，將可能採取斷然處置，對張宣戰。<sup>70</sup> 一下之間，華北空氣突變嚴重。行政院因此特召集秘密會議，討論對付方針。蔣也一再電催張「從速派隊，星夜馳進，以免受制於倭」，並表示「如恐湯疑懼，則可委湯為熱察總指揮，或其他較高名義，以安其心」。總之，「派兵入熱，再不容緩」，希望張決心照辦。<sup>71</sup> 14日，張群抵

<sup>66</sup> 北平華覺明致重慶劉湘有電（民國21年6月25日），《閻檔·各方往來電》，微捲第62捲。

<sup>67</sup> 參張學良：《雜憶隨感漫錄》，下冊，頁90。

<sup>68</sup> 何柱國：榆關失陷前後，《文史資料選輯》，第37輯（中國文史出版社），頁55。

<sup>69</sup> 張學良之地位，《東亞》，1932年10月號，參閱司馬桑敦：《張學良評傳》，頁173-174。

<sup>70</sup> 南京新六師通訊處致蓬安李家鈺庚電（民國21年7月8日），《閻檔·各方往來電》，微捲第62捲。

<sup>71</sup> 《蔣檔·事略稿本》，民國21年7月10、13日條。

平，張學良精神一振，不僅表示誓死擁護蔣的剿共計畫，對於處置熱河及應付日本等事，也惟蔣意旨是從。<sup>72</sup>

然而，就如張自我調侃所說的：「我常立志，不是立長志」<sup>73</sup>，張並未完全遵從蔣的意旨行事。18日張群電蔣：「頃據漢卿云：動員部隊正照計畫前進，惟湯處已去兩電，尚未得復，不無可慮。」可見，張對入熱一事，仍是投鼠忌器，總想取得湯的諒解。雖然張也強調，「萬一（湯）反抗，即決入熱河」。但從後續發展研判，這種決心恐怕只有五分鐘熱度。<sup>74</sup>再者，當時北平流傳，只要張離開平津，就可以「消去日方目標」，解除日軍威脅，也使張以為日方兵力不足，無力對關內用兵，所以藉此宣傳以除己勢力，而心存僥倖。經過張群連日的溝通，及18日日軍轟炸朝陽寺事件後，張終於決定派兵五旅集中熱邊長城線上。<sup>75</sup>不過，這個計畫是否付諸實行，並無下文。因為一個星期之後，張對防衛熱河的計畫又有新的方向。

張如此漫不經心，連一向對他倚重的蔣都感到無奈，更遑論對他印象極差的汪了。汪認為國家已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光是寄望張行動，根本無濟於事。因此，21日，汪除電飭張自衛抵抗外，並電請蔣速回京，共商應付策略。結果，張回電表示，「正為救援熱河，恢復東北失地，進行一切準備；如事勢擴大，即親自出關督師，熱存與存，熱亡與亡」；而蔣則回電謂，剿共軍事緊張，暫難回京，已令張「於受侵襲時盡力抵抗」。<sup>76</sup>乍看之下，張還滿積極的。可惜，張的這股鬥志維持不了三天，連華北的一些軍官長都看不下去，公開地請張群轉達中央，希望對張有較切較近的辦法。<sup>77</sup>事實上，蔣對張也不完全放心。23日，蔣

<sup>72</sup> 北平華覺明致漢口何成濬銑電（民國21年7月16日），《閻檔·各方往來電》，微捲第62捲。

<sup>73</sup> 張之宇：從張學良日記看自傳的撰寫歷程及心境，收錄於《雜憶隨感漫錄—張學良自傳體遺著》（臺北：歷史智庫，2002年），頁23。

<sup>74</sup> 張群呈蔣委員長七月巧電（民國21年7月18日），《蔣檔·革命文獻拓影》，統一時期第16冊—長城戰役，上冊，頁32。按所謂的「動員部隊正照計畫前進」，應該是指王以哲旅進出古北口外。然王旅一行動即為湯軍發現，認為「來意非善，不可輕恕」，而企圖以武力解決，最後不了了之。如此看來，張湯之間究竟有無電文往來溝通，內容為何，仍待商榷。參唐精武：湯玉麟放棄熱河的實況，《文史資料選輯》，第14輯，頁46-48。

<sup>75</sup> 張友坤、錢進主編：《張學良年譜》，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1932年7月19日條，頁615。

<sup>76</sup> 蔡德金、王升編著：《汪精衛生平紀事》，1932年7月21日條，頁180；張友坤、錢進主編：《張學良年譜》，上冊，1932年7月22日條，頁616。

<sup>77</sup> 《徐永昌日記》，第2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民國79年），民國21年7月24日條，頁495-496。

一面致電張群，追查張是否按照計畫進行；另一方面則指示汪、宋子文，對於「漢卿之款，務請於本月抄籌匯五十萬元，以免藉口中止進兵，但須視其第一期集中於熱邊計劃有否實行耳」。可見，連蔣都擔心張會找藉口，拖延進兵的時間。蔣之所以放手讓張負責，一是急於在9月之前解決鄂豫共軍，無暇北上；二是判斷日軍不敢立即以主力進擾交通不便的熱河。

<sup>78</sup> 但汪擔負政治責任，卻沒耐心再等待了，所以他乾脆直接表示「如再不抵抗，決引咎辭職」<sup>79</sup>。

汪一再以個人去留為籌碼，企圖透過輿論的力量，脅蔣撤張或進行抵抗，這一方面固然有實際「攘外」的急迫性，但另一方面也表示汪已到了無計可施的地步。汪自彈劾案後，一會兒飛廬山，一會兒飛北平，一會兒在上海，一會兒又在南京召開專家會議，目的就是為了協商應變時局的方策。但不論是他所堅持的：對俄無條件復交、對張斷然撤辦；或任朱慶瀾為義勇軍總指揮、統一華北財政等等，沒有一樣如願的。<sup>80</sup> 這自然是當初決定上台的汪所始料未及的，抑鬱進而憤怒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汪真正的壓力，恐怕還是來自輿論。汪上台時，有些人對他還抱有希望，汪對自己也有些期許，希望能有一番作為，得到民眾的支持。誰知，辛苦地飛來飛去，盼到的卻是「追悼革命的汪精衛」一文，諷刺他沒有骨氣，台上下判若兩人；馮玉祥更是譏其為蔣的「傳令兵」、「馬弁式的行政院長」；而時人也表示，如果在不久的將來，政府無其他宣示或行動，足以證實外交「求之在己」的話，民眾恐怕會懷疑政府根本就沒有新方針，只是一時興奮，隨便說說而已。<sup>81</sup> 汪向來注重民意，如

<sup>78</sup> 緣日軍18日進軍朝陽寺，20日即退出，所以蔣以為日軍擾熱，卻遲遲未進，是因為熱河交通不便的緣故。《蔣檔·事略稿本》，民國21年7月22、23日條。

<sup>79</sup> 鎮江邱譽致吉安陳誠徑午電（民國21年7月25日），《閩檔·各方往來電》，微捲第62捲。

<sup>80</sup> 按汪原本打算恢復中俄邦交，締結協定，在北滿協力對抗日本侵略；並由張任命朱慶瀾為義勇軍總指揮，擾亂南滿治安，從南北兩方夾擊日滿軍。張友坤、錢進主編：《張學良年譜》，上冊，1932年6月18日條，頁615。然中政會認為中俄必須先訂不侵犯條約（擔心中共、新疆、外蒙問題），俟俄方有誠意，再行正式復交。但俄方以為即使俄要對日行動，也不須與中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因為中國實在太弱了；俄想要的只是中俄外交常態的恢復。在此一情況下，中俄交涉一直沒有進展。7月由於日軍侵擾熱河，汪才主張無條件復交，但情形並不如想像中的順利。而任朱慶瀾為義勇軍總指揮一事，蔣張以為義勇軍行動乃民眾自發性的愛國表現，不必亦不能授以軍委會名義，否則只是增添日軍尋釁的藉口罷了。至於財政問題，連財政專家宋子文都因籌款困難，而有求去之請，更何況是汪。

<sup>81</sup>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3冊（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1932年7月3、5日條，頁651-652；周炳琳：對日新方針與討伐偽國，《獨立評論》，第7號（民國21年7月3日），頁6。

果因張不配合而失信於民，代人受過，倒不如潔身引退，留個好名聲。不過，以汪對張的評價，汪大概不會甘心為張去職。

汪在沒辦法的情況下，打算出走。而張迫於形勢，卻不得不稍做改變。為因應華北危局和對中央有所交待，張於26~31日召開北平政務委員會會議。據說華北各將領晤面時，「人人皆以主戰為榮，雖有持重之輩亦不敢稍持異議」。<sup>82</sup> 在這種情勢下，張對子彈、軍餉雖有剴切的計慮，但勢如騎虎，已難稍示畏怯。為此，張一面懇請中央速予籌濟軍實餉項，另一方面則發表宣言，以「改善內政，整理軍政」為方針，遵照中央命令，精誠團結，共謀捍衛。<sup>83</sup> 會上，並對整個華北軍事作一部署。由於消息指出，日方「將緩攻熱，而急攻張」，所以決議將主力集中於平津地區，東北軍力不足時，由魯晉派隊增援。至於熱河方面，則責成湯玉麟專事防禦，監視日本態度。換句話說，先前派東北軍進擊熱河的計畫將暫停，改以援助湯死守熱河。<sup>84</sup> 這顯然與蔣汪攻取熱河的意願相違。不過，如果湯願意接納援軍入熱，也算稍有進展。所以，8月5日蔣得知報告後，即電張群轉告張，「既決心進兵熱河，即當速進」，「否則時機一過，必致敗亡」，希望張能當機立斷，先發制人，勿為人所制。<sup>85</sup> 沒想到，張還來不及思考如何行動，翌日就爆發汪辭職並公開驅張事件。對蔣而言，一個是政治上不得不的搭擋，一個是軍事上必須的夥伴，如何因應，就看蔣的政治謀略了。

## 肆、「吃燒餅換個饅頭」？<sup>86</sup>

從汪發動政潮的時間來看，張的索款電應是此次事件的導火線。因為汪8月5日上午接到張的索款電，下午就飛上海與宋子文協商。這中間兩人談了些什麼，不得而知。但汪試圖解決問題的心境，卻是明顯可知。只是以後續的發展推測，結論大概是無法支應張的要求。汪因之害怕張如蔣所擔心的一藉口款項不到，而中止進兵或無法抵抗，致使自己承擔不抵抗的後果和罪責，所以先發制人。對汪而言，藉由公論讓張自動辭職，恐怕要比以行政院長身

<sup>82</sup> 北平華覺明致漢口何成瀆陷電（民國21年7月30日），《閻檔·各方往來電》，微捲第62捲。

<sup>83</sup> 北平政務委員會大會宣言（民國21年7月31日），《革命文獻》，第38輯，頁2186。

<sup>84</sup> 參 上海徐次珩致成都鄧錫侯卅二電（民國21年7月30日），《閻檔·各方往來電》，微捲第62捲；張友坤、錢進主編：《張學良年譜》，上冊，1932年7月31日條，頁617。

<sup>85</sup> 《蔣檔·事略稿本》，民國21年8月5日條。

<sup>86</sup> 此為吳稚暉對汪張交惡事件最後結果的說法。轉引自許育銘：《汪兆銘與國民政府：1931至1936年對日問題下的政治變動》，頁175。

分免去張職，經過內部研商、蔣的同意，來得容易。何況，張並無明顯不遵中央號令的行為，汪也師出無名。但以張「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訴諸公論，效果卻明顯不同。因為此電一發，等於是制止張以款項未到而不抵抗的可能；而且，汪以此方式強烈表達中央抗日的決心，張若不辭，則未來華北的發展與汪無關；張若因此下台，汪便可如願改革華北政治，另創新局。當然，這個論述的前提是汪仍然在職。

以汪歷來的行止，很難讓人相信他辭職的決心。因為堅持己見時，可以以辭職相要脅；不痛快時，也可以憤而辭職，「辭職」一舉幾乎成了汪政治上的籌碼。而汪之所以敢如此「大擯烏紗帽」，恐怕是認為時局沒他不行。這並不是說汪自以為表現得有多好，而是他知道不論是蔣或整個中國，都必須靠他坐鎮中央，支撐危局。因為就如時人所言，一切殘餘的政治組織，沒有一個有力量站出來接受政權；萬一汪政府塌台，中國將陷入無政府狀態。<sup>87</sup>所謂「一個爛政府，總比無政府強」，汪相信蔣和一些黨政要人，不可能就這樣讓他走，一定會像昔日一樣地慰留他。

不管汪是為了個人的政治生涯，還是為了國家的生死存亡，<sup>88</sup>「抗日」一事畢竟是「公務」，為何張會認為是「私人恩怨」？在張的想法裡，汪「除空言外，無實在禦侮整個計畫及全盤指導辦法，除發熱烈呼號外，絕少有力組織」<sup>89</sup>，自然不肯為汪的「空言」、「呼號」而犧牲同袍，所以6月中旬才會拒絕汪「小加抗拒」的要求。這是張認為自己得罪汪的地方。<sup>90</sup>另一方面，由於蔣無暇負責華北事務，對張極其依賴和遷就，也使張自認一切係經蔣（對張而言，蔣即中央）指示或同意辦理，汪說他割據地方「遠於事實」。對張而言，汪所言皆非事實，則汪針對他發動政潮，除了個人的恩怨意氣之爭，還能是什麼？在這種思維之下，張即使願意離職，當然也要說清楚，講明白。

而蔣在8月6日晚接到汪的辭職電，第一個反應便是「季新（汪）為人無定識，無定力，不知責任為何物」，不過盱衡全局，「剿匪正在進行之中，北方倭寇方張，熱河危在旦夕，如我中央政局動搖，不惟有礙剿匪，而且徒張寇燄」，汪若不迅速回京主持，則北方形勢更急。因此，蔣一面電請林森主席、宋子文等立勸汪回京復職，以維大局；一面直接電汪，表示理解其「必欲一去，以作士氣而振紀綱」的心意，請汪顧念環境艱危，返駕主持。

<sup>87</sup> 孟真：中國現在要有政府，《獨立評論》，第5號（民國21年6月19日），頁6-9。

<sup>88</sup> 事實上，對任何一個執政者而言，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問題。

<sup>89</sup> 荊有岩：張學良駐節北平軍政概述，《文史資料選輯》，第35輯（總第135輯），頁12。

<sup>90</sup> 參郭冠英：張學良說（此訪談時間為1990年復活節，王一方家中），張學良與西安事變學術座談會（中國近代史學會主辦，2001年11月17日，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頁11。

但另一方面，蔣又擔心張因汪的斥責，而心生反感，遂電張群轉勸張，以大局為重，忍耐處之，並交代「北方同胞尤不宜亟有抗辯，以免益陷僵局，更加糾紛，徒為倭寇造機會」。<sup>91</sup>

蔣雖然採取兩面安撫的手法，但對於汪督責張抵抗之事，卻深有同感。為打開僵局和解決華北危局計，蔣認為「無論漢卿辭職與否，應於三日以內，親率所部急趨熱河，以最秘密最敏捷之方法行之，不宜稍涉游移」，這樣對內對外才有轉機。為此，蔣9日向張提出三策：一、不辭職而帶兵入熱抗日；二、辭職而帶兵入熱抗日；三、辭職而改組北平綏靖公署。請張權衡得失，取其最有裨於轉移大局，並穩站個人立場者，擇一而行。<sup>92</sup>就當時的情勢而言，東北義勇軍正向日軍發起總攻擊，張若能趁機進兵熱河，中日局勢或許會有所轉變，張個人與東北軍也可重建聲譽，站穩立場，進而消弭內紛。沒想到，張仍然猶豫依違，不敢前進，選擇第三策。這下子，連蔣都認為張「誠不足與共事」，而感到「可痛、可歎」了！<sup>93</sup>

其實，張這時堅持不帶兵入熱的心態，並不難理解。因為之前不願進兵熱河的種種困難和因素，並未改變，如果因汪的無理取鬧，被迫入熱，結局可能是：一、順利佔熱，從而印證汪斥責張是「不抵抗」，而不是「不能抵抗」的事實。當然，順利占熱的機率，就張的思考角度，微乎其微。二、行動失敗，犧牲同胞，再次對不起東北人，乃至成為國家民族的罪人。所以，張寧可選擇第三策，辭職出國。但張以「年未而立，即負方面」的意氣，顧盼自雄，顯然也不願對汪示弱。10日，張提出三項政治主張：

- 一、政府籌款與彼大宗現款（非空言），使其充實軍實上之準備：糧秣餉糈，足三五個月之用，軍實到手若干，如飛機、槍彈等，張願躬率士卒出關，收復失地，成則贖失地之愆，敗則馬革裹屍，甘心所願；
- 二、如政府辦不到，則請速允其辭職之請，以遂其初志，藉可全日人之顏面，及可緩和日軍對華之空氣，開始對日談判，打開此中日間之昏暗局面；
- 三、第一第二兩項如皆辦不通，國人應促請蔣介石氏，或蔣自向國民及各派負責聲明，請求准彼一人負責去幹事，不許妨害彼之行動或主張，假以一年二年工夫，成功失敗，完全負責。否則前仇舊怨均藉外交報復，非亡國不可。<sup>94</sup>

<sup>91</sup> 《蔣檔·事略稿本》，民國21年8月6、7日條。

<sup>92</sup> 《蔣檔·事略稿本》，民國21年8月8、9日條。

<sup>93</sup> 《蔣檔·事略稿本》，民國21年8月9日條。

<sup>94</sup> 一月來的中國，《申報月刊》，第1卷第3號，頁146；北平華覺明致漢口何成濬真電（民國21年8月11日），《閻檔·各方往來電》，微捲第62捲。

以上的主張，仔細揣摩，其實還是針對汪而發。第一項指出汪空言抵抗的事實，並非張不願抵抗；第二項近乎譏諷，暗示汪企圖犧牲張，以「消去日方目標」，達成個人對日交涉的目的；第三項則明白表示蔣的行動和主張，受到汪的掣肘，甚至點出此次政潮就是汪藉口抗日問題，進行私人恩怨報復的結果。按理說，以蔣與汪張之間的關係，應扮演中間橋樑、溝通的角色，但從第三項張的認知來看，蔣不僅遷就張的行止，對汪的政策也敷衍了事，才會造成汪張之間意見不一，各自以為所行一切皆得到蔣的認可。此外，10日蔣囑汪代表唐有壬轉告汪，「北方及出兵熱河計劃之實情；如魚日能略加忍耐，不發表攻擊電文，則出兵之計可成，今竟激成北方將領之怨憤，而使此計中阻」<sup>95</sup>，顯示汪在張拒絕出兵熱河之後，根本不知道蔣張還在為此事磋商進行中。以此論之，蔣對此次政潮的發生也要負一部分責任。

基本上，蔣處理此事，是以「打開僵局，維持汪張現職」為主。然張選擇辭職，建議改組北平綏靖公署為軍委會分會；汪又堅持「以允張辭職為復職條件」<sup>96</sup>，令蔣憤慨二人「皆為私而不顧大局」，一度決定自任行政院長和北平軍委會分會委員長。不過，以當時情勢論—行政院各部會長總辭（9日），表明與汪同進退；反蔣各派又以「斥張留汪」為由，蠢蠢欲動，蔣事實上不可能自任行政院長。在此一情勢下，蔣只能讓張離職，也期待因張之去職和日本更換關東軍司令的同時，展開中日新局；但基於「汪事前與閩蔡（廷鍇）與晉閻（錫山）皆有接洽，以倒張為制蔣之本」的傳聞，蔣明確指示張群，對於張所部實力，「斷不容他人侵損，倘再有進一步企圖侵損，或蓄意虐待者」，決不遷就；並表示這是「中與漢卿對汪最大容忍之限度」。<sup>97</sup>

蔣決定棄張挽汪後，即電宋子文、何應欽等邀約汪至廬山面商，以迅速解決一切。於是，原本秘不見客的汪，13日終於現身與宋、何等晤談。16日，國民政府明令准張辭去北平綏靖公署主任職。至此，汪認為去張目的已達，遂於17日返京，出席中政會，報告辭職緣由及議決時政。18日，汪偕宋、何等人飛廬山晤蔣。據蔣所言，汪當時面談十萬言，並無辭職的意思。其實，汪在得知蔣決允張辭職後，即表示「決俟中央准張與彼辭職，即回京，仍以友誼態度與蔣確實合作，共赴國難」，對粵方主張另組政府，已反對而拒絕之；不過，

<sup>95</sup> 《蔣檔·事略稿本》，民國21年8月10日條。

<sup>96</sup> 蔡德金、王升編著：《汪精衛生平紀事》，1932年8月10日條，頁181。

<sup>97</sup> 《蔣檔·事略稿本》，民國21年8月10、11、12日條。

如果蔣必留張，粵必另組，屆時只能旁觀。<sup>98</sup> 顯示汪第一問題仍在去張，只要張去，汪個人去留似不成問題。這一企圖，從張下台一事生變，汪又堅決不肯回任，可以得到印證。

在維持張所部實力的原則下，蔣對張處置華北軍政的各項措施，都予以遷就配合。如北平分會委員人選，由張推舉候核；凡綏靖署重要職員，皆可改任分會職員；以王樹常為平津衛戍司令、于學忠為河北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為察哈爾省政府主席等等。但中央一面免張，一面卻積極挽汪，看在東北幹部的眼裡，自然不是滋味，他們斥汪「苟且出山，胡亂下野，以國家最高之政治機能，視為個人意志鬥爭之工具，無價出賣坐待亡國之民」<sup>99</sup>，懷疑汪要求華北抵抗的背後意圖。而市面上少數傳單，宣稱汪此次舉動曾事先與蔣密商過，計劃第一步倒張，第二步倒閻（錫山）韓（復榘）；加上，張又未列名北平軍分會，更使部分的華北將領心生疑慮。<sup>100</sup> 於是 17 日，宋哲元等五十七名將領聯名發電留張，<sup>101</sup> 表示「華北治安，關係重大，鈞座膺國家之殷寄，負軍事之重責，詎可循一人之要求，輕言高蹈」，「如鈞座毅然引去，則哲元等亦惟有避位讓賢，隨鈞座以俱去」。<sup>102</sup> 言下之意，三軍官長留帥，將置政府命令於不顧了。

對於華北將領與張共進退的舉動，蔣雖然表示可以體會各官長「失其師保」的「惶惑之情」，也立即電復張群，以張學良代行北平軍分會委員長職權；但私下卻相當不以為然地電張諷示，「弟（蔣自稱）兩次下野，所部並無挽留之電可為先例，重掌兵符端在時機之到，不必在部下強挽也」<sup>103</sup>。其實，蔣之不高興，多半是因為華北將領的舉動，讓他有受脅迫的感覺。而且，蔣先評局勢，認為「軍分會中，漢卿兄之名不必加入為妥」，「只要漢卿之實力不損，彼仍以私人名義駐平主持」，<sup>104</sup> 則形式上，張已去職，不論對汪或民眾都有交待；對日而言，消去其打擊尋釁的目標，中日或有商談的機會。而私底下，華北仍在張的掌控之下，既不損東北軍實力，又可代表蔣維持北方局面。對張來說，更是免去內外各方的

<sup>98</sup> 《蔣檔·事略稿本》，民國 21 年 8 月 18 日條；上海冷融致成都劉文輝元電（民國 21 年 8 月 13 日），《閻檔·各方往來電》，微捲第 62 捲。

<sup>99</sup> 荊有岩：張學良駐節北平軍政概述，《文史資料選輯》，第 35 輯（總第 135 輯），頁 12。

<sup>100</sup> 北平華覺明致漢口何成濬電（民國 21 年 8 月 17 日），《閻檔·各方往來電》，微捲第 62 捲。

<sup>101</sup> 有人指出華北將領挽張電，係奉系人物主稿，意在體面，並無其他用意；而局外人不知，感到驚愕，誤以為將有大糾紛，其實不確。天津林世則致陽泉張維藩皓二電（民國 21 年 8 月 19 日），《閻檔·各方往來電》，微捲第 62 捲。

<sup>102</sup> 李雲漢編：《抗戰前華北政局史料》（臺北：正中書局，民國 71 年），頁 12。

<sup>103</sup> 天津林世則致陽泉張維藩沁電（民國 21 年 8 月 27 日），《閻檔·各方往來電》，微捲第 62 捲。

<sup>104</sup> 《蔣檔·事略稿本》，民國 21 年 8 月 13 日條。

攻擊。於公於私，都是一著妙棋。可惜，此一著棋，因不明究理的東北軍反彈，無法澈底實行。隨後，華北各種告急消息，接踵而至；<sup>105</sup> 而蔣原意主持北方大局的人選—黃郛，因「各方形勢未明，事實毫無把握」，也不敢驟允北上。<sup>106</sup> 因此，20日，蔣還是明電張學良代理北平軍分會委員長。至此，張表示決計留北平城內，應付事變，待蔣北上指揮。這表示蔣若不能北上，張也不可能去平出國了。汪22日之所以堅決不回任，恐怕就是氣不過，搞了半天，張仍然掌控華北軍政。

在汪堅決不回任的情況下，吳稚暉提出折衷辦法，對汪辭行政院長職一案，暫時保留，俟三中全會解決；行政院長，依法由副院長宋子文代理。這樣，表面上是汪張均不復職，實際上是汪張俱留不去。這種「吃燒餅換個饅頭」的結果，對華北局勢並無實質的助益。不過，半個月就解決，對蔣而言，還是好事一樁。因為當時的軍政各界認為：只要蔣張關係不變，華北政局就不會動搖；只要蔣汪仍舊合作，南京中央就穩定。所以，蔣汪合作初期，反蔣各派雖有連結的動作，還不敢輕舉妄動。但是，汪張交惡後，汪張和政府中央部會首長相繼辭職，蔣等於失去穩定南北政局的兩個左右手，局勢一陣混亂。而中央與地方首長的「可能出缺」，也引起一些失意政客、軍人的覬覦和競爭。一時之間，軍政各界騷動，暗潮洶湧，蠢蠢欲動，準備取而代之（汪張之職位，甚至是蔣的位置）。因此，迅速解決此事，以穩定國內政局，還是有必要的。

## 伍、結 語

汪以一介文人，在「棄胡就蔣」的情況下執掌政權，為求取反蔣各派的諒解和輿論媒體的支持，所以急著實現向來所標榜的「民主政治」藍圖，以塑造個人完美的政治形象。沒想到，在內政改革上，「打破以軍領政」這個重點計畫，遭到軍政各界的懷疑、反彈，困難重重，最後不了了之；籌備已久的國難會議，好不容易召開了，卻只得到一個虛名。而外交上，「一面抵抗」，內部問題叢生；「一面交涉」，處處受制於人，未了還遭到監察院長的彈

<sup>105</sup> 據說，熱河情形其實並不像外間傳聞那麼嚴重，所有各種告急消息，多出自北平當局，另有作用。

天津林世則致陽泉張維藩沁電（民國21年8月27日），《閩檔·各方往來電》，微捲第62捲。

<sup>106</sup> 參沈雲龍編著：《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65年），民國21年8月13、14日條，頁495；《蔣檔·事略稿本》，民國21年8月13日條。

効。在這種處境下，局勢愈形緊張的華北，成了眾所矚目的焦點，當然也成了汪扳回劣勢、再次出發的舞台，誰知又碰上「膽大妄為，不受操縱」的張，又急又氣的汪只好以自己辭職為賭注，公開驅張。

汪之所以發動政潮，確因「對日問題」的急迫性，以致不滿張的「抵抗態度」而起，然其目的係在先發制人，爭取輿論的同情，以打破華北僵局，贏得政治上的優勢，並無與蔣相抗衡的意味，當然也談不上是愛國心切。由於時勢所需，蔣必須仰賴汪坐鎮中央，才能穩定政局，專一剿共；汪則必須依恃蔣的軍事實力，才能安內攘外，對民交待。因此，兩人對時局的因應雖有不同的看法和做法，但還能維持一定程度的和諧。同樣地，蔣張因軍事上的結合—蔣必須靠張協同維持方面，張則期待蔣傾全國之力收復東北，所以彼此之間也是儘可能地相互尊重和配合。汪以為張凡事都聽命於蔣，顯然是估計錯誤。反觀汪張之間，既無相關利益的牽連，唯一關聯的蔣，又兩邊遷就，虛與委蛇，以致對日方針左右搖擺無法確立，汪張心結也就隨之而生了。

平心而論，蔣、汪、張三人其實都希望中國能對日進行抵抗，只是站在各自的利害關係考量上，抵抗的時機和條件有所差別罷了。汪肩負政治責任，承受輿論壓力，傾向於「無條件抗戰」。即不論準備與否，勝負不計，打了再說；只要抵抗了，對內對外有所交待，形勢一變，個人和國家都有轉機。所以，汪急於打破現狀，以開創新局。相對於汪的「無條件抗戰」，張為東北軍的前途和守住既有的地盤計，要求的是「統籌抗戰」，要打就要有整體的計畫和準備，以及全面開打的決心，否則以東北軍單打獨鬥，作「瓦碎」似的犧牲，就敬謝不敏了。因此，在中央未有決心和準備以前，張寧可避免與日發生衝突，靜待中央政策的轉變。汪張交惡的引爆點，也就在這一急一緩、立場各異的抗日態度上。而蔣基於中日國力對比的考量，和自身對共軍發展的疑懼，深信「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所以當時的目標是放在「安內」上，對日則傾向於「緩兵備戰」。即檯面上暫時忍耐，檯面下一步步準備，等共軍問題解決後，再進行長期抵抗。是以，蔣對汪張交惡事件的因應，著重在「維持現狀，安定政局」，以便早日完成剿共軍事，但仍要求張進兵熱河，以資準備。

如此，三人基於利害關係的考量不同，在抵抗問題上的步調不一，又不肯開誠布公的協商討論，才會相互猜疑，進而導致此一事件的發生。

當然，汪張交惡背後的意象，並非僅僅止於上面所談論的。它其實還凸顯了中國內部的四分五裂，派系紛爭，地方軍閥一味自保，中央政府形同虛設的可悲景象。任何國家政府、地方，以及社會各界，在對外政策問題上的判斷和看法，都難免會存在意見分歧。但在一個具有強有力，或真正統一的中央權威的國家裡，這些意見分歧並不會演變成政府內部，或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嚴重內訌；任何封疆大吏或地方軍政官員，也不可能像張那樣，以種種理由

拒不執行中央政府的命令。即或萬一發生類似情況，中央政府也斷不至如汪那樣，要通過揚言辭職，調動輿論來向張施加壓力，逼張就範。總之，汪張交惡的背後，更多地是當時中國政治關係複雜弔詭的一種反映。本文因篇幅所限，對此不擬多加分析，所以僅是簡略提及以示重視。

## 徵引書目

### (一) 檔案、史料彙編

《蔣中正總統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文物圖書·事略稿本(民國20-21年)。

特交檔案，中日戰爭第14卷—淞滬抗戰。

革命文獻拓影，統一時期第16冊—長城戰役，上冊。

《閻錫山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各方往來電文錄存(民國21年)，微捲第61、62捲。

李雲漢編，《抗戰前華北政局史料》。臺北：正中書局，民國71年。

周美華編，《國民政府軍政組織史料》，第1冊。臺北：國史館，民國85年。

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編纂委員會。

第36輯—日本侵華有關史料(六)。民國54年6月。

第38輯—日本侵華有關史料(八)。民國54年12月。

### (二) 文集、日記、年譜、回憶錄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3冊。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

何柱國，榆關失陷前後，《文史資料選輯》，第37輯，中國文史出版社。

李鏐、汪瑞炯、趙令揚編註，《苦笑錄：陳公博回憶(1925-1936)》。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

究中心。

沈雲龍編著，《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65年。

沈雲龍輯註，胡適與張學良來往書信，《傳記文學》，第41卷第6期。

汪兆銘，《汪精衛先生最近言論集》。香港：南華日報社，民國19年。

唐精武，湯玉麟放棄熱河的實況，《文史資料選輯》，第14輯。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2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民國79年。

荊有岩，張學良駐節北平軍政概述，《文史資料選輯》，第35輯（總第135輯）。

張友坤、錢進主編，《張學良年譜》，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

張學良，《雜憶隨感漫錄》，下冊。收藏於臺北國史館：《蔣經國總統檔案》。

張學良原著，張之宇校註，《雜憶隨感漫錄—張學良自傳體遺著》。臺北：歷史智庫，2002年。

畢萬聞主編，《張學良文集》，第1冊。北京：新華出版社，1992年。

郭冠英，張學良說。中國近代史學會主辦：張學良與西安事變學術座談會，2001年11月17日，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

程天固，《程天固回憶錄》。香港：龍門書店，1978年。

蔣作賓，《蔣作賓日記》。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

蔡德金、王升編著，《汪精衛生平紀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

### (三) 專著、論文

王克文，《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權》。臺北：國史館，2001年。

王軍，張學良與1932年南京政潮，《中國現代史》，1993年第5期。

司馬桑敦（王光逖），《張學良評傳》。臺北：傳記文學雜誌社編印，民國78年。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臺北：綜合月刊社，民國62年。

李國祁，從個性談汪精衛的歷史功過，《歷史月刊》，第68期。

張同新編註，《蔣汪合作的國民政府》。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張魁堂，《張學良傳》。臺北：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年4月2刷。

許育銘，《汪兆銘與國民政府：1931至1936年對日問題下的政治變動》。臺北：國史館，民國88年。

陳錫璋，《廣州樞府史話》。臺北：黎明文化公司，民國68年。

陶菊隱，汪精衛這個人，《中外雜誌》，第20卷第4期。  
劉博崑，九一八惡夢錄，《傳記文學》，第9卷第3期。  
蔡德金，《汪精衛評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 (四) 公報、期刊、報紙

一月來的中國，《申報月刊》，第1卷第3號（民國21年9月15日）。  
上海停戰協定簽字，《大公報》，社評，民國21年5月6日。  
上海圓桌會議問題，《大公報》，社評，民國21年5月22日。  
近日之山海關，《大公報》，社評，民國21年5月13日。  
軍事與外交，《大公報》，社評，民國21年2月16日。  
國難會議與國難，《大公報》（天津），社評，民國20年12月13日。  
國難會議與誠信問題，《大公報》，社評，民國21年4月1日。  
華北風雲緊急之謠傳，《申報》，時評，民國21年7月5日。  
對日新方針之確立與進行，《大公報》，社評，民國21年5月31日。  
周炳琳，對日新方針與討伐偽國，《獨立評論》，第7號（民國21年7月3日）。  
孟真，中國現在要有政府，《獨立評論》，第5號（民國21年6月19日）。  
孟真，監察院與汪精衛，《獨立評論》，第4號（民國21年6月12日）。  
胡適，上海戰事的結束，《獨立評論》，第1號（民國21年5月22日）。  
張梓生，半年來的中國，《申報月刊》，第1卷第1號（民國21年7月15日）。  
陳清晨，東北義勇軍之考察，《申報月刊》，第1卷第3號（民國21年9月15日）。  
蔣廷黻，參加國難會議的回顧，《獨立評論》，第1號（民國21年5月22日）。